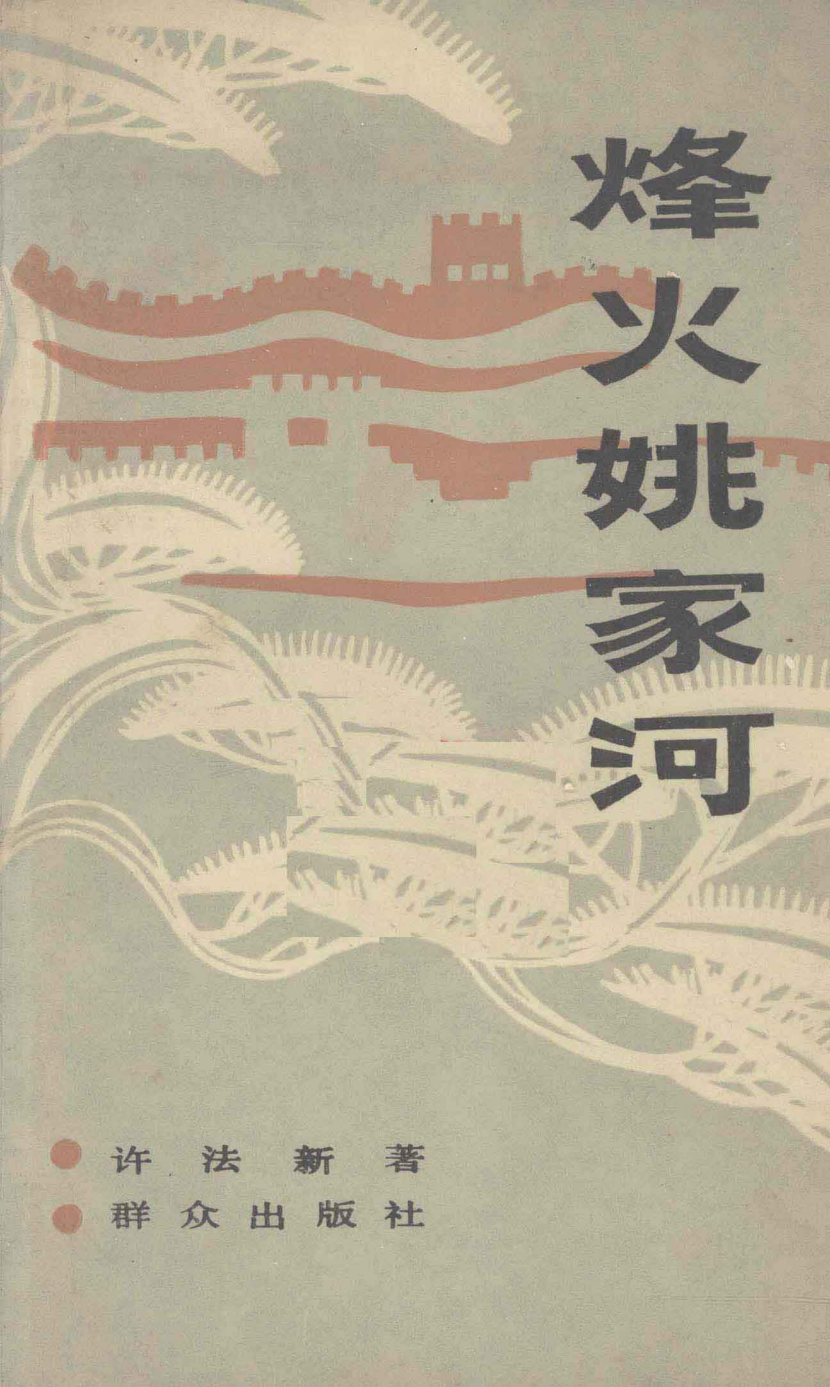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烽火姚家河

● 许 法 新 著
● 群 众 出 版 社

烽火姚家河

许
群
众
出
版
社
著

烽火姚家河

许法新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4.25印张 71千字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66 定价：0.78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3000册

目 录

浩荡慰忠魂·····	(1)
卢沟桥漫步·····	(7)
青色的城一条街 ·····	(14)
桥·····	(18)
存瑞的父亲·····	(22)
存瑞的光辉·····	(25)
人民代表马寅初 ·····	(29)
烽火姚家河·····	(35)
访鹿钟麟·····	(51)
郑凤荣·····	(59)
海外留学生·····	(66)
“三岔口”新旧之争 ·····	(72)
侯喜瑞印象记·····	(83)
裘盛戎·····	(100)
后记·····	(129)

浩 荡 慰 忠 魂

——北京革命公墓巡礼

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地区，每年清明前后，总有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结队而来，共产党员在这里过党的生活；共青团员在这里过团日；少先队员在这里过队日。通过对革命先烈的纪念活动，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。

十年浩劫，也波及革命公墓。在林彪、江青、康生一伙别有用心的策划指使下，不少墓地被挖掘了；不少石碑被推翻或砸碎了；不少墓盖被凿上或漆上“叛徒”“特务”“打倒”等等字样；甚至有的石碑被汽车拖运走了，说是拉去接受批斗，从此一去不复返；还有暴尸骨于光天化日之下，年深月久，连尸骨都无处寻觅了。一九七〇年清明节前一天，我们来到这里，那时到处是荒墓残碑，满目凄凉。但是，年年清明，年年仍有人前来，这就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一伙害怕了，

怕人民群众面对这严峻的活生生的现实，会对他们更加仇恨，于是在一九七二年下了一道“禁令”，说什么清明是“鬼节”，扫墓是宣扬封建迷信。革命公墓的大门被迫关上了，但清明扫墓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早已深入人心。一九七六年清明，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，终于爆发了伟大的群众性的“四五”运动，为粉碎万恶的“四人帮”奠定了强大的基础。此后，每年清明，人们都涌向天安门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献诗，八宝山革命公墓似乎被人们遗忘了。直到一九八〇年的清明节之前，报上发表群众来信，要求重修革命公墓，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念。

首都春意渐浓，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修复工作也已基本完成。最近，趁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我又专程去重访了阔别十年的“八宝山”。

在葱葱茏茏的苍松翠柏覆盖下，八宝山的山顶、山腰、山下平列着的一行行陵墓，不仅恢复了旧观，而且整饰如新。在人的视野内，真是一派令人起敬的肃穆景象。

我怀着崇敬的心情，沿着人行小道，边走边浏览着墓碑上的遗像，默念着墓碑上的姓名。如果不仔细端详，是很难看出那些曾被破坏的痕迹的。有一块新立的石碑，却没有墓志。据公墓管理人员老赵说，原碑砸碎了，碑文无法辨认；向家属索取底稿，又因底稿早被抄丢了，于是只能刻个姓名。好在家属是通情达理的，认为死者能

继续长眠在八宝山革命墓地，就是不再写墓志，生者、死者也都会安心的。我又看到另一块新碑，只有死者姓名，却没有称呼。问起原因，老赵感叹着说，这也是“四人帮”留下的余毒。墓志对死者的称呼，不外是烈士、同志、先生三类。当时那些破坏者们气势汹汹地闯进墓区，不问情由，见刻有“先生”二字的就推、就砸。据统计，被推、被砸的石碑，以“先生”的比例最大。现在，有些同志尚心有余悸，便免去称呼，只写个“某某某之墓”就行了。

“八宝山”，实际是京西郊鲁谷村的一片土丘。它的西部在很早以前就是坟场，售地葬人；还有个老山骨灰堂。一九五〇年，任弼时同志因病逝世，下葬在东部坡顶上——被称为八宝山革命第一墓。后来，开国第一任副主席之一的张澜老人逝世，葬在墓右，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纪念瞿秋白烈士牺牲二十周年时，党又把秋白同志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墓左，这就形成了第一墓区。接着，又扩展了第二墓区，第三墓区。墓盖都是水泥制成的，墓碑都是汉白玉石雕刻的。数了一数，一共有五百三十五座，都是对革命事业有所贡献的人。其中有流血献身的英烈，也有科学、教育、文化界的著名人士。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史沫特莱、斯特朗的陵墓也筑在这里。这里曾一度称为“烈士公墓”，后来改称“革命公墓”，这就更加名副其实了。

革命公墓一直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景仰，要求前来参观的很多，影响是很大的，也是很广泛的。但在十年浩劫中，在极左思潮的疯狂摧毁下，竟有四十八座陵墓遭到严重破坏，这还不包括那些被推倒的墓石，被凿刻、涂抹“特务”“叛徒”“打倒”字样的陵墓。如果加上自然损坏的，要有三分之一的陵墓需要修复。现在，仅仅一年时间，由于工人们的辛勤劳动，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已把公墓地区整修一新，看了真使人深受感动。

我们来到革命骨灰堂。这里原是一座古老的庙宇，建于明朝中叶，名“护国寺”。还是在六十年代初，毛主席建议共产党员身后一律火化。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“死不占地”。公墓地区不再出现新墓了，护国寺大殿便改为骨灰堂一室，一盒一盒的骨灰，按着送来的时间前后顺序陈列起来。陈列满堂了，又辟前殿为一室副室。目前为止，已有骨灰室十一间了。

我们恭恭敬敬地迈进骨灰堂一室的正门，里面没有耀眼的富丽堂皇的装饰，却充满严肃、庄重、静穆的气氛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迎面正中的一座骨灰盒（101号），在金黄色油漆的木盒上雕刻着一位军人头像，啊，朱德元帅！紧挨着朱总的（102号）骨灰盒上却是一位没有戴帽、微笑着的军人半身照，啊，是彭德怀元帅！我似是有意识，又似无意识地寻找到了陈毅元帅的骨

灰盒；寻找到了罗荣桓元帅的骨灰盒……“贺龙元帅的呢？”我询问公墓管理员老张同志，他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指了指右上方，原来贺总的骨灰盒端端正正地放在（81号）座位上。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的骨灰盒放在（81号）座位上，真是绝妙的巧合。这时，老张为我们讲起贺总骨灰的故事，一个听来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，中央决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，为贺龙同志举行追悼会。事前，总参谋部派人取来一个小黑骨灰盒，据说是从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找到的，盒盖上积土盈寸，骨灰证上写着“王玉”字样。总参的同志经心地拭去积土，然后出示收条，上写“今收到王玉（即贺龙）骨灰一份”。此情此景，使在场的人悲痛得掀起心来。总参的同志立刻换了个新漆的大骨灰盒，配上了红绸带。贺总的家人薛明、贺鹏飞同志已经哭不成声了。举行追悼会那天，周恩来总理拖着重病赶来参加。看到总理满面病容、身体消瘦，不少人落下泪来。老张沉痛地说：“开国以来，总理到这里不知有多少次了，这却是最后一次，给人印象太深了。”

五位开国元勋的遗骨就在这庄严朴实的大堂上陈列着。他们功盖天下，他们接受千千万万人民的瞻仰，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！当然，骨灰堂里陈列的，还有不少领导国家思想建设、经济建设、文化建设的政治家；还有不少身经百战、屡

建奇功的将军；还有不少名驰中外的有所成就的科学家、教育家、文艺家……当然，我也看到为了团结大业，经过斗争，回归祖国的李宗仁先生的骨灰盒，看到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大功的傅作义将军的骨灰盒……

丽日当空，时已近午。正当我们要向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时，看到大门口有一群青年男女，人人手拿扫把，神情严肃，正在鱼贯而入。据公墓管理人员老张说：他们都是主动来扫墓的，出于对老一辈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，每当清明前后，成群结队前来这里扫墓的青少年每天终是络绎不绝。听了老张的话，不禁使我想起了陈毅同志生前曾写过的这样几句诗：当年老战士，今有几人存？新生千百万，浩荡慰忠魂。

中外瞩目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必将永世长存，万古长青！

1981年3月

卢沟桥漫步

拂晓，我来到卢沟桥。原想欣赏一下的“卢沟晓月”，在西天偏角上只剩下一钩淡淡的白痕。这时，东方红了半边天，旭日初升了。

桥，对我是不陌生的。我沿着石栏缓步而行，抚摩着每座石狮子。我回想着二十年前跨上石栏点数石狮子的情景，我端详着这些雕刻精致的石狮子，有的怒目张吻，有的低首伸舌，……每一种姿态，给我的感觉都是妩媚动人。我默默地赞美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有魅力的艺术创造。

站在身旁的年轻的阎乡长，还以为我在点数石狮子呢。他笑着说，他是卢沟桥土生土养的，听了“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”那套话，从十来岁起就数来数去，石狮子一共二百八十八个，是数清了；可是石狮子身上的子狮总也数不清。什么原因呢？过去想不透；今天是明白了：因为子狮太小，久经风剥雨蚀，有些形状已经模糊，很容易被看成是绣球、狮尾。他说：“会数清的，

只要有耐心就行。现在是不兴说过去那套‘数不清’的话了，那是迷信，那是不科学。”

我望望他那张神情坚毅的脸，我也笑了。

“匡当”“匡当”，疏落的铃声自远而近的传来，几匹骆驼走上石桥。

领驼的老魏，坐在“卢沟晓月”石碑下面，点燃一支烟，他一边歇歇腿；一边和我扯起往日骆驼的盛况。

早年，口（张家口）内外到北京的运输，大部分要依靠骆驼。卢沟桥一带养过上万口骆驼，成天成夜的铃声不断，可热闹极啦！如今只剩下两百来口，也都入了社了。老魏是领着骆驼刚从门头沟驮石灰回来。天要是一入伏，他又要领着这几匹骆驼到口外避暑去了。

老魏领驼也有四十个年头了，应该说他对这项工作已有深厚的感情，可是在他那张黝黑多皱的脸上找不出一丝留恋过去的痕迹，我有点惊异。他回答得好：“共产党给咱们把道路修好了，又平坦，又宽绰。你看汽车、胶轮大马车走起来多便利；一辆大马车能拉四千斤，一口骆驼顶多驮上四百斤。要不是这几口骆驼拖住我，我早去赶大车啦！……”

汽笛长鸣，一列火车从石桥北的铁桥上驶过。老魏扭头瞅了瞅，羡慕地笑了：“你瞧，咱们还有火车呢！”

“陈玉清大爷，支书呢？”年轻的乡长对迎面走来的一位老年农民说。

“下地啦！”老年农民笑嘻嘻地回答。

“您呢？”

“一早就想下地，支书不答应，一定要俺找大夫……”说着推了推头上白毛巾，指着脑门上一个红疙瘩，还是笑嘻嘻地说：“瞧瞧这个红疙瘩去。”

多么善良的老人啊，八字黑须掩遮不住笑口，他的内心是多么愉快。

回忆起“七七”事变，陈玉清站在桥中央，指指点点地叙述当年卢沟桥抗战的情形。他说，二十年前他们过的就是穷得抬不起头的日子。可是卢沟桥炮声一响，他们挺立起来了。谁也不愿意这块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被敌人占据，大家都不逃走，用行动支援守军，送水送饭，当担架；使仅有一个营的二十九军守军能够坚守二十多天。当陈玉清谈到守军根据农民的情报，派大刀队摸黑杀敌的时候，我的心也随着紧张、跳动，不自主地低声哼了两句当时流行的抗战歌曲：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，全国武装弟兄们……”

卢沟桥沦陷前夕，人们差不多都走光了。陈玉清的老娘走不动，他咬咬牙说：“妈，我背着您，也要走！”

河北各县相继沦陷，他们不能长期流浪在

外，陆续回来了。敌人迎接他们的是逮捕、屠杀，更残酷毒辣的是用饥饿来扼杀他们抗敌的意志。青壮年终日劳动，连混合面都吃不饱，哪里还能养家呀！不少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顺墙一溜倒下死了；不少人卖妻子儿女；……沦陷八年，卢沟桥的三几百户人家，在一九四一年这一年里，就饿死了两三百人。好容易熬到抗战胜利了，国民党带回来的不是幸福，而是同样的灾害！……

“现在过得怎么样？”我有点明知故问。

“什么？过去跟现在比，那可差老鼻子啦！”陈玉清老头又嘻嘻地笑了。

陈玉清谈起他们的农业社，谈起他们社员的生活。我才知道他还是农业社的监委呢。

丰台区一共有十二个农业社，卢沟桥社是其中最小的一个。在合作化高潮中，原准备把它并入别的大社内，可是有人建议要保留卢沟桥这个历史特点。于是，卢沟桥乡定名了，卢沟桥高级农业社建立起来了。

永定河两岸的土质不好，净是石头。全社四千来亩地只能种些花生、白薯，还是“种一葫芦收一瓢”，年年收成不够吃。单干的时候，地没有人种，连牲口粪都卖了。一千八百多个农民只好搞副业——运输石头、石灰来维持生活。可总是富裕不了。合作化以后，荒废的田地重垦起来了，牲口粪不再往外卖，还要从外面购买肥料。

过去的农业收入微乎其微，现在已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了。今年，全社正为争取大丰收而努力呢！

土质不好，挖出来的石头子可是建筑上的好材料。为了更好地供应首都需要，他们已集中六十辆大车，专搞运输。社员的生活跟着有很大的提高。

“提高多少呢？”

“这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：全社四百六十二户，去年每户平均收入六百十三元。”一捋八字黑须，陈玉清老头又嘻嘻地笑了。

桥头几步，有个小茶馆。在这里，我们遇见信用社主任何保全。老何头已经六十五岁了。他过去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，参加过“二七”大罢工。长年的过重劳动，压得他的背微微驼着；可是他的精神好极了。他絮絮叨叨地谈着卢沟桥的种种传说；谈着铁路工人生活，谈着“二七”大游行、大罢工的轰轰烈烈情形。

当我问到他是怎样离开铁路的，他挺了挺腰，说：“咱是四十年的老工人啦！解放后工人当家作主，应该好好地干下去，可是人老了，还偏偏得个血压高的毛病。一九五二年退休了。共产党对我们工人真是没说的，给我百分之七十退休金。每月不干事，净拿四十多块。

“劳动大半辈子的人，怎么闲得住呢；再说

光拿钱不干事，又有点心愧。整天闷在家里，眼看着社会主义一个劲地朝前奔，可更憋不住啦！后来听说信用社要人，我就赶忙来了。嗨，竟当上主任啦！虽说是个义务职，我干得比拿工资也不差。咱们是工人阶级，不能忘本啊！……”

北京西城有条“赵登禹路”；赵登禹的坟墓就在卢沟桥附近。

乡长告诉我：解放前夕，这里是一抔黄土。野草碎石，很是凄凉。

一九五〇年间，当驻扎在这里的人民解放军知道了这抔黄土里埋的是赵登禹的时候，他们毫不犹豫地扛起铁镐、铁铤，为这抔黄土砌起砖石，还一道一道地抹上青石灰；墓地周围铺平了，又筑起石台阶；栽上不少灌木。赵登禹家属再次来这里扫墓，差点认不出来了。

我们最能分辨是非的人民部队，是只知道这里埋的是一位死在敌人飞机大炮下的将军，他应该受人凭吊，受人尊敬；要是墓地荒废了，应该为他修起来。谁也不多考虑这是个国民党的将军呀！可是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我知道就有不少善于挖掘人家坟墓的坏蛋。

谁都喜爱桥，谁都更喜爱有历史意义的桥。爱伦堡的小说《暴风雨》里，有位苏联军官说过：“最美丽的东西就是桥——它使一个时代跨

越到另一个时代。”在这里，卢沟桥就给这句话作了证实。

六百多年前，蒙古人在这里和金兵打了最后一仗，进占北京，成立元朝；后来，朱元璋起义江北，带兵打到这里，经过血战，占领卢沟桥，元顺帝连北京都不守一守，就逃出关外；而仅仅二十年前，在全国人民强大力量推动下，国民党握住了共产党第二次向他们伸出来的手，在七月七日一个波光残月上下荡漾的深夜，民族解放战争的炮声，在卢沟桥上响了。八年后，日本军国主义者被逐出中国神圣的领土。

二十年的时间，在历史上只是一瞬，可是对我们生长在这个动荡时代的人，却深深感到变化是多么的巨大。今日卢沟桥，给我以一种劲勇而沉静的感觉，它既不是宋、元、明、清封建王朝时代的卢沟桥，也不是国民党统治、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时期的卢沟桥。我站在桥上，望着来来往往的劳动人民，二十年前衣裳褴褛、面有菜色的是看不到了；所看到的是精神饱满，身强力壮的。卢沟桥已经是人民的卢沟桥了。

1957年7月8日